

墨书陶瓷上的花押和宋元花押印

[日] 石黒ひさ子

内容提要：日本博多遗址群出土的有些中国陶瓷的圈足内底部能看到用墨书写的文字、记号等，这样带有墨书的陶瓷被称为“墨书陶瓷”，本文对墨书陶瓷上的花押和宋元花押印初步进行比较。为了解墨书陶瓷上的“花押文字”，宋元花押印的存在很重要，墨书陶瓷上的“花押文字”都是为了辨别个人的花押，花押的图案、款式种类比较多，但是墨书陶瓷上、花押印和宋代公文书上的花押可以一样分类，可以说宋元时期的花押在同一概念下各个方面利用的。

关键词：墨书陶瓷 宋元花押印 博多遗址（日本）

日本博多遗址是自1977年伴随福冈市地铁工程开始发掘工作，已经发掘40年的遗址。遗址范围所在是在福冈市中心车站博多车站的西北部夹在两条河（御笠川和那珂川）地方的地下部分，南北宽1.6千米，东西长0.8千米，遗址总面积大约是120万平方米。福冈在日本古代有鸿胪馆，废弃鸿胪馆以后贸易中心移到博多地区，从日本平安时期后期（公元11世纪）到江户时代发布“锁国令”（1639年），博多地区很隆盛，是日本中世时期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港口商业城市。2017年，博多遗迹群出土文物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相当于国家一级文物）。

在博多遗址调查过的地点已经超过220多个，发掘总面积也超过8.2万平方米，出土文物的装箱有3万多个，出土文物总计有35万多件，其中这次被指定的文物是2138件。2138件之中占有超过半数 is 陶瓷器，其中包括在中国制造的陶瓷器1067件，可以说代表博多遗址的出土文物还是贸易陶瓷。

博多出土的有些中国陶瓷的圈足内底部能看到用墨书写的文字、记号等，这样带有墨书的陶瓷被称为“墨书陶瓷”，在博多遗址上已经发现的总量其实不少，《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资料集成》^[1]和《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资料集成2》^[2]两本上集成的墨书陶瓷有2139件。带有墨书的陶瓷大部分属于公元11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后半期，大约处于中国南宋时期。按佐伯弘次的整理，墨书内容有（1）○○纲，（2）中国人名，（3）日本人名，（4）数字，（5）人名以外的汉字，（6）

[1] [日] 博多研究会：《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资料集成》，1996年。

[2] [日] 大庭康时：《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资料集成2》，《博多研究会志法哈哒》第11号，2003年。

研究,他认为“墨书是在贸易过程中,出于实际需要所做的标识性记号,方便货物的搬运、摆放和辨认”,“从功能的角度将墨书分为标识所有者、标识批次数和标记放位置三类,有助于理解墨书的性质”。博多遗址和南海 I 号所见的墨书中,单从写“直”字也比较多的情况来考虑,对于“置”字,“直”字的看法表示疑问^[1]。2015年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墨书,梁如龙整理这些墨书,他对于“直”字有两个看法,姓+直或姓名+直的直是置办、购买,意思为某姓的人购置的瓷器,从而和他人区别出来,单写“直”字就有十多个不同的写法,因而对于单独的“直”字不能理解为置办,尚待商榷。^[2](图2—4)。

刘海宇除了博多出土的、福州出土的墨书陶瓷以外,还利用韩国泰安郡马岛海域的水下考古里出水的墨书陶瓷,检讨了“花押”分类。对于“置”字、“直”字,他引用了田中克子的“不管怎样,按其笔迹可以辨别个人,也是跟花押(签字)一样的意思”^[3]的看法,所有“花押”类的字分为A到E的6类,他认为“花押”是别人不能模仿的本人独特的签字,应有独自性、唯一性的,分类A、B、C的3类有几种某姓+花押组合,他不承认这样花押的独自性、唯一性,看到的不是花押,是某一个字,也表明A、B、C的3类“花押”是“纲”字的草书的可能性不能否定。^[4]

田中克子发现在沉船出水陶瓷和窑址出土的窑具也有跟“花押”相似的铭款,也整理博多遗址墨书的“花押”,分A到F的6类。她利用的沉船资料是1996年在印尼爪哇海西北部发现调查的沉船“Java Sea Wreck”出水的陶瓷,这些出水陶瓷的年代用她的看法来说是公元12世纪第3四半期(大约是1130年到1145年),跟“花押”相似的“符号”在福建德化窑白瓷盒子和绿釉黑彩或绿釉印花黑彩的盒子、水注上都能看到,铭款是阳印刻文,“花押”相似的铭款也有几种,她分类的B、C、D、E类都存在。福建建阳芦花坪窑址、福建东山县后壁山窑址出土的窑具(匣钵)上刻字的符号里也有“花押”相似的铭款,跟她分类的E类相似。对于这些“花押”,她表示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生产管理者的商标,另一个是订货者的商标。^[5]

除了上述资料以外,中国其他地点也有出土墨书陶瓷,也可以看到“花押”。内蒙古包头燕家梁出土元末墨书陶瓷里也可以看到“花押”^[6](图5),和田中分类A类相似。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出土的宋代墨书陶瓷也有“花押”^[7](图6—7),和田中分类C、D类和B类相似。江苏镇江北宋时期遗址也有出土“花押”^[8](图8),和田中分类C、D类相似。杭州出土南宋瓷器标本里也有“花

[1] 陈波:《南海 I 号墨书问题研究——兼论宋元海上贸易的人员组织关系》,《东南文化》2013 年第 3 期,第 97—105 页。

[2] 梁如龙:《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瓷器墨书分析》,《福建文博》2016 年第 4 期,第 33—37 页。

[3] [日]田中克子:《韩国泰安马岛海域出土中国陶磁器から見た东アジア海域海上贸易の一样相—博多遗迹群出土の中国陶磁器との比较を通じて—》,(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研究所:《泰安马岛出水中国陶磁器》,2013 年版,第 210—235 页。

[4] 刘海宇:《中国産陶磁器の墨书铭の所谓“花押”に関する一考察》,《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三集,2015 年,第 131—137 页。

[5] [日]田中克子:《墨书陶磁器再考—博多出土“花押”墨书の意味—》,亀井明德さん追悼文集刊行会:《亀井明德氏追悼・贸易陶磁研究等论文集》,2016 年版,第 172—181 页。

[6] 内蒙古文物研究所·宋小军:《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彩版 289—2。

[7]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6—147 页。

[8] 刘建国:《名城地下的名城——镇江城市发掘考古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8 页。

押”^[1]（图9），和田中分类B类相似。墨书陶瓷和墨书陶瓷上的“花押”并不是只有博多遗址、福州和海上贸易有关，应该考虑为宋代前后的全中国情况。

三

目前研究墨书陶瓷和它的花押问题的论述，都是从陶瓷考古研究的看法来研究，特别注意贸易陶瓷、外销陶瓷的问题，可是没有注意到中国古印问题。著者也侥幸有机会跟孙慰祖老师一起考察才认识到，可是古印研究方面已经有孙老师的大作《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2]。通过孙老师的研究，花押印的起源并不是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的元代不能写字的蒙古色目人开始用花押印的，而是五代、北宋时期一面还在保留手书画押的方式一面就已经开始使用印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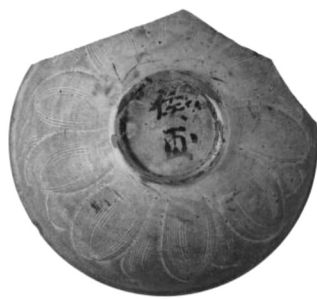


图9 杭州出土墨书陶瓷

《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记录的花押印和博多遗址群墨书花押可以比较。表1是根据田中克子的分类来做成的。有田中分类的A到F的特点的花押印在《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里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上面看过，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墨书陶瓷的花押并不是博多独自存在的，福州出土的墨书陶瓷上的花押也可以一样分类，而且还有南海I号出水墨书陶瓷，韩国泰安郡马岛海域出水墨书陶瓷，“Java Sea Wreck”出水陶瓷上的刻书，福建建阳芦花坪窑址、福建东山县后壁山窑址出土的窑具（匣钵）上刻字，内蒙古包头燕家梁、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江苏镇江北宋时期遗址，以及杭州出土的南宋瓷器标本里的墨书陶瓷等都有存在，也可以说墨书陶瓷上的花押跟花押印上的花押一样，都是按当时的“花押”标准来说一样规格做的“花押”的。

宋代花押有各种款式，可是不是表示“置”“直”或者“纲”那样的具体的一个字，都是只有表示个人的标记。宋代的花押在公文书的实物资料里也可以找到花押的事例。宋代寺院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要得敕牒，拿到后将敕牒摹刻于石头，制作石碑。河北涉县娲皇宫停驂宫里所藏的“宋代觉慈寺敕牒碑”也是类似事例之一（图10）^[3]。虽然这座石碑抬头残缺，立碑的具体时间和刻石工匠姓名也没有，可是敕牒发布的具体时间、发敕牒的签发人都很明确，发布时间是“大观四年二月二日”，颁发敕牒的是“中大夫守右丞刘”“中大夫守左丞薛”“特进左仆射”。大观四年是公元1110年，徽宗之世，北宋到1127年灭亡，这座石碑应是在1127年之前制作的。从文献记载可以判断“中大夫守右丞刘”是副相刘正夫，“中大夫守左丞薛”是副相薛昂，“特进左仆射”没有姓，可是这个官名和时间来说，应该是何执中^[4]。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官员下面有花押，三个人都是一种图案性的花押（图11）。“中大夫守右

[1]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7页。

[2] 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 陈慧、李静：《涉县娲皇宫藏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小议》，《文物春秋》2012年第5期，第60—62页。

[4] 陈慧、李静：《涉县娲皇宫藏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小议》，《文物春秋》2012年第5期，第60—62页。还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三种花押是“花押印”，可是这张敕牒已在石头上刻过，原来是画的花押还是盖的花押印都不清楚，不知道根据什么证据来看“花押印”，但是如果这些花押盖“花押印”的话，就是用“花押印”的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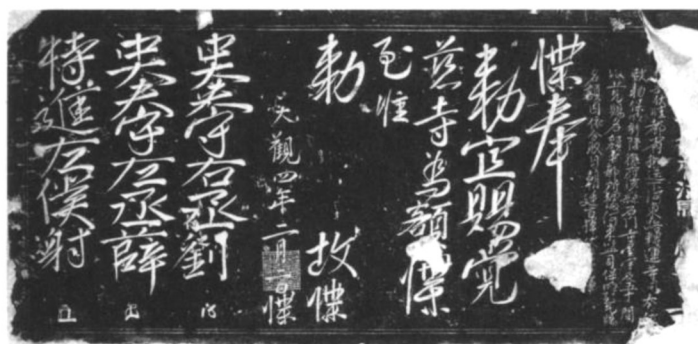


图10 “觉慈寺敕牒”碑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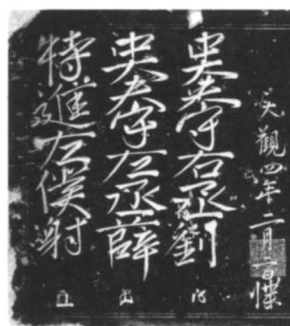


图11 “觉慈寺敕牒”碑拓片部分



图12 “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拓片

丞刘”的下面有“”，在田中分类D里有相似的；“中大夫守左丞薛”的下面有“”，在田中分类E里有相似的；“特进左仆射”的下面有“”，在田中分类B里有相似的。

还有一个跟觉慈寺敕牒碑年代接近的资料，是“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这座碑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区隆兴寺，碑上部刻录大观二年尚书省向成德军洪济禅院传达圣旨的札子，下部刻录大观二年成德军府照会洪济禅院执行敕命的帖子（图12）。^[1]上部的尚书省札是大观二年（1108），比“宋代觉慈寺敕牒碑”早两年，公元1108年的“札”，“札”是比“敕”低一点的文书，石碑的做法也简单一点，可是文书最后还是有花押。花押有两种，一个在“尚书省印”下面的“”，另一个在日子下面的“”。跟“宋代觉慈寺敕牒碑”一样，日子下面是地位最高，应该是宰相，“尚书省印”的下面应是尚书省左丞、右丞。大观二年，蔡京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林摅为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徐处仁因母病故，没有参加公务，所以可以说“”是蔡京的花押，“”是林摅的花押^[2]。

“”在田中分类D里有相似的，“”在田中分类E里有相似的。

这两种石碑资料，原文书只差了两年时间，可是宰相、尚书丞有交代，这些情况都从花押看出来。换句话说，用花押可以辨别个人。“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和“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上能看到的花押是图案化、抽象化比较大的花押，但是连

[1] 刘友恒、郭玲娣、樊瑞平：《正定洪济寺、舍利寺相关文物综述》，《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第65—71页。

[2] 杨倩描：《北宋〈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考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36—42页。

表1 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花押”墨书和花押印

（根据田中克子《墨书陶磁器再考—博多出土“花押”墨书の意味—》，《亀井明德氏追悼・貿易陶磁研究等论文集》2016年，p172図1作成，分类后括号内：其他论文作者姓/分类，《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根据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登载的）

A（张/置，黄/直E，梁/直，刘/B）	《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
A類	
B（黄/直A・B，刘/C・E）	
B類	
C（刘/A）	
C類	
D（刘/A）	
D類	
E（黄/直C，刘/B・F）	
E類	
F（张/置，黄/直D，梁/直，刘/D）	
F類	

宰相都可以辨别，也证明作为个人辨别的工具花押是一个能用的东西。从这五个花押来看，可以了解花押的图案化、抽象化比较大，款式范围也比较宽。从这里来看，墨书陶瓷上的“花押文字”应该都是花押，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字，是可以辨别个人的花押。

四

为了解墨书陶瓷上的“花押文字”，宋元花押印的存在很重要，过去在墨书陶瓷上很模糊的“花押”概念都可以解决了。墨书陶瓷上的“花押文字”都是为了辨别个人的花押，花押的图案、款式种类比较多，但是墨书陶瓷上、花押印和宋代公文书上的花押可以一样分类，应该按同一概念的范围内使用，可以说宋元花押在同一概念下各个方面利用的。

大量墨书陶瓷出土的博多遗址群已经发掘40年，为什么一直没有注意花押印的存在呢？博多遗址群除了陶瓷以外，跟当时的生活有关的各种生活用品也出土过，可是到现在没有出土过宋代花押印。这是墨书陶瓷“花押文字”研究一直没注意宋元私印的最大理由。

目前跟博多遗址有关的地点，发现只有一个中国印，那不是在博多，是在新安沉船里被发现的。新安沉船是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的元代贸易船，1975年发现后已经通过几次发掘调



图13 新安沉船出水骨角印

查，出水过大量的水下考古文物，可是其全貌还不太明确，研讨最多还是出水最多陶瓷产品。著者开始注意花押印问题的时候，福岡市埋藏文化财中心主任的大庭康时老师让著者提醒，新安沉船出水文物里有骨头做的骨角印，印面有一个花押和一只鹿（图13）。新安沉船出水的花押印，其实是宋元花押印之中很少见的考古发掘品，宋元花押印大约都是传世品，能知道出土地点的花押印几乎没有。^[1]

宋元时期以中国为中心，东亚周边地域经济交流发展很发达，商人商品的来往也很繁盛。跨越不同语言的地方辨别个人，“花押”很方便。墨书陶瓷上常能看到花押表明写墨书款的目的跟贸易有关的可能性大。墨书陶瓷出土地点即便也有内陆地区，但也不能否定从中国南部的海港城市出土是更多的。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虽然是一个离海边很远的地方，可此地很可能是跟草原地区有交易的地方。从经济交流的观点来看，墨书陶瓷出土地点可以说是贸易交流比较多的地方。

使用墨书陶瓷时间在公元11世纪到12世纪的博多毫无疑问是个国际贸易城市，当时的贸易是以中国商人中心，跨国商人使用花押的机会应该很多，为了更多方便也会使用花押印，博多遗址群已经发现了不少带有花押的墨书陶瓷，那么为什么到现在只有一个新安沉船里出水的花押印，博多遗址群却没有出现花押印？

这是个很难拿出答案的问题。最后要谈谈笔者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个是到宋代，公元11世纪的日本列岛基本上会使用汉字，而在日本花押是从草书写名开始独自复杂进化，在宋代中国流

[1] 据孙慰祖老师的指教说，在《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里登载的内蒙古博物馆藏印是内蒙古本地收集或出土的印。

行的简化花押，更简化的花押印在博多不太受欢迎，只有在从中国进口到日本的陶瓷上存在有些花押。另一个可能性是材料问题，目前在古印收藏里保存的花押印几乎都是铜印，新安沉船出水的花押印是骨角印，也有可能在水下环境才能偶然保存，在博多使用的花押印，如果是用木头或骨角制造的印的话，在遗址上就不会保存得太好，也几乎不会保存至今。

图版说明

图1博多遗址群出土墨书陶瓷（大庭康时：《中世日本最大の貿易都市博多遺跡群》，新泉社2009年版，第40页图26。）

图2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墨书瓷器《姓名类1》（梁如龙：《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瓷器墨书分析》，《福建文博》2016年第4期，第34页图一。）

图3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墨书瓷器《姓名类2》（梁如龙：《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瓷器墨书分析》，《福建文博》2016年第4期，第34页图二）

图4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墨书瓷器《单字类》（梁如龙：《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河沟出土瓷器墨书分析》，《福建文博》2016年第4期，第35页图三）

图5内蒙古包头燕家梁出土墨书陶瓷（内蒙古文物研究·宋小军：《包头燕家梁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彩版289-2）

图6—7山东胶州板桥镇遗址出土墨书陶瓷（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147页）

图8江苏镇江出土墨书陶瓷（刘建国：《名城地下的名城——镇江城市发掘考古纪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

图9杭州出土墨书陶瓷（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清·雅——南宋瓷器精品》，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7页）

图10“觉慈寺敕牒”碑拓片（陈慧、李静：《涉县娲皇宫藏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小议》，《文物春秋》2012年第5期，第61页图一）

图11“觉慈寺敕牒”碑拓片部分（陈慧、李静：《涉县娲皇宫藏宋代觉慈寺敕牒碑小议》，《文物春秋》2012年第5期，第61页图一）

图12“真定府洪济禅院敕文札子碑”拓片（刘友恒、郭玲娣、樊瑞平：《正定洪济寺、舍利寺相关文物综述》，《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第69页图7）

图13新安沉船出水骨角印（韩国国立海洋遗物展示馆：《바다로 보는 우리역사》，2003年版，第71页）

（作者系日本明治大学日本古代学研究所客员研究员、讲师）